

名家自述丛书

回忆后记

大约在公元一九三一年到一九

三三年之间上海第一出版社一位林

先生向我约稿，他们要出版一套自

传丛书，已经收到了郁达夫和沈从文

的稿子，还有别的作家的著作。他们看

见我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《杨嫂》——

自传之一，希望我也为他们写一本那

样的自传。我想，写回忆很简单，有多

少，我就写多少。我的事不用自传的名

创作回忆录

巴金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K825.6
BJ/1

名家自述丛书

创作回忆录

巴金 著



046026

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创作回忆录/巴金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97.12

(名家自述丛书)

ISBN 7-02-002566-8

I. 创… II. 巴… III. 巴金-回忆录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8990 号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91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4.125 插页 4

198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定价 7.70 元

的长辈们的压力下，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。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，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，又怎样医治，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，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，受苦，没有青春，没有幸福，终于悲惨地死亡。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、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。我十九岁离开旧家庭就象摔掉一个可怕的黑影。我二十三岁，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，想找寻一条救人、救世、也救自己的道路。说救人救世，未免有些夸大，说救自己，倒是真话。当时的情况是这样：我有感情无法倾吐，有爱憎无处宣泄，好象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，一颗心无处安放，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，我就活不下去。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，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，我寂寞，我痛苦，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，我想念祖国，想念亲人。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，人民正在遭受屠杀。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，他们是萨珂（N. Sacco）和樊塞蒂（B. Vanzetti），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，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，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“演讲会”、“抗议会”的海报。我读到所谓“犯人”之一的樊塞蒂的“自传”，里面有这样的话：“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，每个口都有面包，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，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。”我非常激动，樊塞蒂讲了我心里的话。

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（Pantheon）旁边，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，在阴雨的黄昏，我站在卢骚的铜像前对这位“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”的“日内瓦公民”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。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，我坐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。

(回信后来终于来了，樊塞蒂在信中写道“青年是人类的希望。”几个月以后，他给处死在电椅上，五十年后他们两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。我在第一本小说《灭亡》的序上称樊塞蒂做我的先生。)就是在这种气氛，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(Notre Dame a Paris)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，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(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，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写不出)，让我的痛苦，我的寂寞，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。我过去的爱和恨，悲哀和欢乐，受苦和同情，希望和挣扎，一齐来到我的笔端，我写得快，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，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。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，我得到了拯救。

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，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。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，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——吉里把它寄回中国，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，征求他的意见，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，给我的大哥看。(当时印费不贵，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，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。)等到这年年底，我回到上海，朋友告诉我，我的小说将在《小说月报》上连载，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，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。《小说月报》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，它给我开了路，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“文坛”。

我的第一本小说在杂志上连载了四期，单行本同年九月出版。我把它献给我的大哥，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，我大哥见到了它。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产自杀，我就删去了“献词”。我还为我的大哥写了另一本小说，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写的《家》，可是小说刚刚在上海一家日报上连载，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的电报，我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。但是通过这小说许

多人了解他的事情，知道封建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。

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。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骚、雨果、左拉和罗曼·罗兰。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，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。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，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。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，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收获。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。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：不说假话。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·赫尔岑、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和高尔基。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《父与子》和《处女地》，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，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。我还有英国老师狄更斯；我也有日本老师，例如夏目漱石、田山花袋、芥川龙之介、武者小路实笃，特别是有岛武郎，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，但我经常背诵有岛的短篇《与幼小者》，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，这个短篇我还是常常背诵。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。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作家的影响。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，中国社会生活。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，我最初还不能驾驭文字，作品中有不少欧化的句子，我边写作，边学习，边修改，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改自己的文章。

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，就在上海定居下来。起初我写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，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。我和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，他住楼上，我住楼下。我自小害怕交际，害怕讲话，不愿同外人接洽。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，我也可以保持安静，不让人来打扰。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，将原稿放在书桌上，他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。例如短篇《狗》就是这样写成，在《小说

月报》上发表的。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，来找我组稿的人也越多。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。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说过：“我是靠友情生活到现在的。”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，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。我完全靠稿费生活，为了写作，避免为生活奔波，我到四十岁才结婚。我没有家，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，我到各处去看朋友，还写一些“旅途随笔”。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，不停地写作。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：“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，好象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，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，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，它们使我的手颤动。我不停地写着。环境永远是这样单调，在一间空敞的屋子里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，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。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，似乎许多、许多人都借着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。我忘了自己，忘了周围的一切。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。我时而蹲在椅子上，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，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。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《家》和其他的中篇小说。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，他们鼓励我，逼着我写出更多的小说。”这就是我作为“作家”的自画像。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发生的战争使我换了住处，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，也没有停止写作。

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，我喜欢日本小说，想学好日文，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月。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，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，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《神·鬼·人》。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有了。因此我今天还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日语讲座，还不曾学好日语。

这年八月，上海的朋友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，要我回去处理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。我编了几种丛书，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了一部分时间和精力，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。写作的时间少了些，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，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。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去南方，以后又回到上海，又去西南，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，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。我的《激流三部曲》就是这样写完的。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造一个简单的“窝”，不久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，随身带一些稿纸，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，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。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，我写《憩园》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，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，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，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，便坐下写起来。这使我想起了果戈理在小旅馆里写作的情景，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，从贵阳旅馆里写起，一直到重庆写完，出版。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《憩园》的末尾，电灯不亮，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燃起来，可是文思未尽，烛油却流光了，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。……

那种日子确不会再来了。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《寒夜》，我知道在日本有三种译本，这小说虽然是在战时的重庆开了头，却是在战后回到上海写成的。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，我自己也称它为“绝望的书”。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，来控诉旧社会，控诉国民党的腐败的统治。小说的结尾是重庆街头的寒冷的夜。去年在法国尼斯有一位女读者拿了书来，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，我就写着：“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痛苦。”过去有一个时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这本书，但是后来我忽然在旧版日译本《寒夜》的书带上看到一句话：

“这是一本燃烧着希望的书。”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。说得好！黑暗到了尽头，黎明就出现了。

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，（但是我学得很不好。）我想用我这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，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。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，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，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。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。有一个时期（1952年），我到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，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，同他们一起生活，我有些胆怯。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，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，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。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，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，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，他们对我格外亲热。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，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，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。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，他们以吃苦为荣，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，到了关键时刻，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。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。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，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。我经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写《第四病室》的时候，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的那句话：“变得善良些，纯洁些，对别人有用些。”我爱上了这些人，爱上了这个环境，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，我不再想到写作。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，因为那些人、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。我一共住了一年。第二次回来，还准备再去，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，我离开斗争的生活，旧习惯又逐渐恢复，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，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，甚至联系中断。因此作品写得不多，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。此外我经常

出国访问，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、赞美新社会、新生活的散文。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“罪证”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中作为“大毒草”受到批判，我也被当作“大文霸”和“黑老 K”关进了牛棚，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。十年中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。

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“四人帮”以及他们的爪牙，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，我认为自己是“罪人”，我的书是“毒草”。甘心认罪服罪。我完全否定自己，准备接受改造，重新做人，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“身体健康，永远健康”。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，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传达室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。可是“四人帮”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，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。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，我会那样听话，诚心诚意地，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他们的训话做。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，别人在愚弄我，我感到空虚，感到幻灭。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，但是我的妻子肖珊在我的身边，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。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“自行消亡”。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。我能分析自己，也能分析别人，以后即使受到“游斗”，受到大会批判，我还能分析、研究那些批判稿，观察那些发言的人。我的头脑渐渐地清醒了，我能够独立思考了，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。在把我批斗了七年之后，“四人帮”王洪文及其爪牙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“决定”，把我的问题作为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，不戴反革命帽子”，只许我搞点翻译。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“不戴帽子的反革命”。他们把我赶出文学界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，给我一条生路。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的亚·赫尔岑的回忆录《往事与随

想》，每天翻译几百字，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，我象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“四人帮”的法西斯专政，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。我就这样活了下来，看到了“四人帮”的灭亡。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，我又拿起了笔。而且分别了十七年之后我又有权、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谈了。

我拿起了笔，我兴奋，我愉快，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，我要写，我要多写。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，我今年已七十六岁。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，不能让它们白白浪费。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，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，一部《创作回忆录》，五本《随想录》，翻译亚·赫尔岑的《回忆录》。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，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《回忆录》的第一册，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，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。有人把我当作“社会名流”，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；有人把我当作等待“抢救”的材料，找我谈话作记录。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。写什么呢？我写小说，不一定写真实。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、经历作一个总结。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，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、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！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，都经受了考验，也都作了表演，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，实在可笑，实在愚蠢。但当时我们却不是这样看法。我常常这样想：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，认真地解剖自己，那么说不定有一天我又会把残忍、野蛮、愚蠢、荒唐看成庄严、正确。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。我要写两部长篇，一方面偿还欠债，另一方面结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。

我曾经说过：“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。”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，停止探索，我就写不出作品。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，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。我不是一个文学家，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。我的思想有种种的局限性，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。让·雅克·卢骚是我的启蒙老师，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。我常常解剖自己。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，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。爱与憎的冲突，思想与行为的冲突，理智与感情的冲突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……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，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，全部作品。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。我说过：“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。”

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，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。我想来想去的只是一个问题：怎样生活得更美好，做一个更好的人，怎样对读者有帮助，对社会、对人民有贡献。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，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。“四人帮”的爪牙称我的“文集”为“十四卷邪书”。但是我在那些“邪书”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，歌颂高尚的情操。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，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。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；爱祖国，爱人民，爱真理，爱正义，为多数人牺牲自己；人不单是靠吃米活着；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。——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。一九四四年我在《憩园》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：“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，让人们互相了解。你们就象是在寒天送炭，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。”

一九三五年小说《家》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：“自从我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。我的敌人是什么？一

切旧的传统观念，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，一切摧毁爱的努力，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。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，并没有作过妥协。”我因为这一段话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受到多次的批判。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，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协。《家》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。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。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——一个“我说了算”的专制家长，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，还有一些勾心斗角、互相倾轧、损人利己、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——我的长辈们，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，还有受苦、受压迫的“奴隶”们。我写这小说，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，我读这小说，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。我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，多么幼稚！多么简单！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·丹东的话：“大胆，大胆，永远大胆！”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东西。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，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：“我控诉。”我写完了《家》和它的续篇《春》和《秋》，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。今天，在我们中国象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。但是经过十年浩劫，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，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“徘徊”，我虽然年过古稀、满头白发，但是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，我要遵守自己的诺言，绝不放下手中的笔。

我罗嗦地讲了这许多话，都是讲我自己的事情。我想朋友们更关心的是中国文学界的情况。我该怎么说呢？我说形势大好。四个月前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，大会的闭幕词是我作的，里面有一段话我引用在这里，来结束我的讲话：

“今天出席这次大会，看到许多新生力量，许多有勇气、有良

心、有才华、有责任心、敢想、敢写、创作力极其旺盛的，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的青年、中年作家，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。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，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，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，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，我仍然怀着十分热烈的爱，我要同大家一起，尽自己的职责，永远前进。作为作家，就应当对人民、对历史负责。我现在更明白：一个正直的、有良心的作家，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、胆小怕事的人。”

目 次

文学生活五十年 (代序) 1

一 关于《春天里的秋天》..... 1

二 关于《长生塔》..... 7

三 关于《第四病室》..... 14

四 关于《海的梦》..... 23

五 关于《神·鬼·人》..... 34

六 关于《龙·虎·狗》..... 46

七 关于《火》..... 58

八 关于《还魂草》..... 73

九 关于《砂丁》..... 81

十 关于《激流》..... 90

十一 关于《寒夜》..... 105

后 记 117

再 记 118

关于《春天里的秋天》

上星期我会见了两位瑞典文化界的朋友。他们送给我一本瑞典文小书，原来是我的旧作《春天里的秋天》的译本。这是出乎我意外的。这本小书出版于一九七二年，那个时候我还在“靠边”，给剥夺了公民的权利，主要原因就是我写了“流毒很广”的十四卷“邪书”，其中也包括这本中篇小说《春天里的秋天》。

我带着这份礼物回家。我找出我的原作翻看到深夜。屋子里气温是摄氏三十三度。我听见远方火车驶过的声音。这是一个多噪音的炎热的夜。我不想睡。我翻开书，一页一页地，翻着，看着……我想起了四十六年前的事情。那是在一九三二年的春天。我在“一·二八”日军侵犯上海闸北地区以后，迁出了宝山路宝光里。不久，我到福建晋江去看朋友，在那里住了不到两个星期。在那个南方古城里，我有好些朋友，有的是本地人，有的是从上海去的，他们在两所学校里当教师。一所叫黎明高中，校址是过去的武庙（关帝庙）；另一所是平民中学，设在文庙（孔子庙）的旧址。还有一家晋江书店，书店的主人姓沈，也是我的朋友。他常常跟我谈文化界的情况。他几次提到一个生病的少女的名字，简单地讲了她的故事。他希望我去看看这个年轻的读者。我同意了。

在一个雨后的晴天，沈和另一个教书的朋友陪我走过泥泞的田畔小路，去访问这个陌生的姑娘。在本地有钱人家的庄院

里，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，我看见了那个相貌端正的少女。她躺在宽大的架子床上，身上盖了一幅薄被，看见我们进去，便坐了起来。我们三个人坐在一条长板凳上。沈说明了来意。

姑娘只是微笑。我讲了两三句鼓励的话，沈又重复解释一遍。她看看我，好象要说什么，却只说了两声“谢谢！”再也没有讲别的话。我们在她这里停留了半个小时，谈话不到十句以上。我们告辞的时候，她仍然默默地笑。但是我看见从她的眼里流下了泪珠。……

她的名字我早已忘记。她当时不过二十左右，听说一两年后她就逝世了。她的病一直没有治好。使她疯狂的原因是：父亲逼她同她所不爱的男人结婚，不许她继续上学念书。

这位疯狂的少女的故事折磨着我的心。我太熟悉了！不自由的婚姻，传统观念的束缚，家庭的专制，一句话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，摧残了千千万万年轻的心灵。我说，我要替他们鸣冤。

我回到上海，一口气写成一部中篇小说。放下笔，吐了一口气，我才感到轻松。我觉得我替疯姑娘讲了话了。

其实，我在小说里写的并不是疯姑娘的事情。我不熟悉她的家庭环境和故事的细节，也没有进行过调查或者采访。我想，我也不需要知道那些细节，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人物和情节了。我把小说的背景放在厦门、鼓浪屿，因为我从上海到晋江，来回都在鼓浪屿小住。我喜欢那个风景如画的小岛。我常常坐划子来去厦门，晚上也在海上看到星星。鼓浪屿的春天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在这里我想起了另一个南国的姑娘，她没有发疯，却默默地憔悴死去。我把她的悲剧写在小说里面了。郑佩瑢就是她。不同的是小说里的郑佩瑢向父亲屈服，免得父亲用手枪打死她的恋人，而生活中的那个姑娘却不顾一切要求跟恋人一起